

再论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张 均

摘 要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艺;低层中国;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3-011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259)

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在革命必须被“再生产”为“一个必须告别的过去”^[1]的“八十年代叙述”中有所模糊,但习以数目字管理观察历史的黄仁宇曾有一个判断:“毛及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则是造成一种新的低层组织”“重新造起,与旧社会相当当地缘”^[2](P404),这是精准之见。今日讨论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艺在社会再现方面的得失,亦应由“低层中国”着手。可以说,对 1949 年前“低层中国”的发现与叙述,以及藉文学叙述而参与现实中从“低层”向“基层”的翻转与构造实践,正是此时代文艺能够自立于中国文学史的优胜之处。当然,这一判断与新自由主义观点有所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等也反复解构过经典社会主义文本的历史叙述,但“许多历史叙述都是由被揭秘的(revealed)、被重塑的(reworked)、被建构的(constructed)和遭到解构的(deconstructed)叙述混合构成”^[3](P146),此种在今天遭到解构的文艺在其兴起之初,其实亦深具叛逆、挑战之气质。这意味着,若研究者过度执著、泥陷于当前视角,将很难真正触及过去年代写作者的灵魂以及他们所置身的语境与问题。

一、发现“低层中国”

所谓“低层中国”,主要指长期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乡村,这也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艺社会再现最为重要的部分。不过,论及对乡村社会真相的发现,今日读者可能更相信《白鹿原》等近作,而对《白毛女》以降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苦菜花》《大刀记》等文本颇多疑惑,性情单纯者甚至还会为自己曾经的相信而心怀怨怼。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日作家、读者凭借“后发优势”掌握了真理?其实并不尽然。《白鹿原》《银城故事》《生死疲劳》等小说的出现,的确可用以纠正此前文艺讲述“低层中国”的偏失,但如果不把二者视为可互资有无的对话关系而目为虚假与真实之对立关系,那就不免造成理解过去的粗暴与把握未来的轻率。究其根本,《白鹿原》等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新意识形态”的产物,“没有任何一种对社会的反映形式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将事件框架化,并把某些特定的内容包括在内或排除在外”^[4](P231),故也有其独到之“见”和令人扼腕的“不见”。就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艺而言,其有相对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不见”势难避免,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充分的文学史评价。关键在于,相对于

其前文艺,其“见”是否有独到之处,是否贴合当时社会的大概率真实并能有效应对其时“人心”与社会困境?就此而言,此时代文艺确有优胜于古典文学乃至新文学的独到之见。这涉及三个层面。

一是“低层中国”农民生存境况之发现。关于1949年前的农民生存,在今天主要由新历史主义提供,此种叙述“怀疑单一、大写的‘历史’,寻求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质疑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5],故《白鹿原》中的乡村总体显得平顺、安和,虽有不幸之境况,但主要由自然灾害或外来政治干扰(包括革命)所致。从小说看,一个普通农民,倘若足够勤勉,又笃信规矩,也不难成家立业、过上幸福生活,如黑娃与田小娥单立门户,就靠为人打短工,一年时间就“积攒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铜子和麻钱”^[6](P170),买进九分六厘坡地。以此类推,假如黑娃不卷入政治,大约10年就会挣上一份足够衣食的产业。两相对照,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记述则大不相同,其中充满与土地制度直接相关的贫穷、饥饿与失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妇女穷得袒胸露乳,《大刀记》中农民时常陷入断炊的恐惧,《创业史》中梁三父子用了20年时间都未能达到黑娃一年的成就。那么,哪种记述更见可靠呢?就史料看,此时代文艺的记述应该说比《白鹿原》等更切合大概率的农村事实。其实,当时文学多有直接原型,如梁三老汉直接取材于长安县皇甫村的王三老汉,“(王)平时能吃苦的很,愣干活,不喝酒,不看戏,不逛会,一个钱也不胡花”,但在“旧社会几次想发财过好日子,都弄不好”^[7](P278)。《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原型甄凤山的遭遇更见悲惨:“(甄凤山)13岁时,其父租种了鹿钟麟6亩荒地,不料,是年收成不好,鹿家的管家张伙子依然逼租,其母上树捋树叶时,张令人摇晃树,将其母从树上晃下摔成重伤,数日后身亡。甄凤山只将恨铭记于心,带着弟妹要饭,不久,五弟六弟亦相继饿死。”^[8]这就不止于贫穷了,由之亦可见在甄凤山的周边,并没有真正能起作用的以“能广施惠”“能救患难”(《白鹿原》)为旨的《乡约》,亦无如《银城故事》所述慈善世家屡屡创造的收养孤儿、资助读书之“类似人间神话的故事”^[9](P28)。然而,从更多史料看,王、甄之经历才更是民国农民的日常写照。一份来自1947年太行根据地的报告显示:“(牛槽沟村)二十六户中,终年吃糠食菜者十三户,穿不上棉衣盖不上被子者九户,没房住的三户”“阳关村有一百一十八人当光棍,小孩死亡率也大了,高阳(村)民国二十五年死了四十二个小孩,女十五,男二十七,有许多是无法生活的结果”^[10](P493)。英国学者贝思飞也写道:华北地区“在收成不好的时候,饥民们就吃不成熟的庄稼(吃青),这是一种享受;大米或小米的外皮、树皮、苔藓、甚至鹅粪都可以成为食物。当灾荒袭来时,正如当地民谚所说的,就出现‘妻离子散、白骨遍野’的状况”^[11](P52)。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民国史料中俯拾皆是。因此,其时文艺的记述相当可靠。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广具善心的高门巨族或怡然自得的小自耕农,而是说多为较小概率的事实。改革开放时代的部分文学之所以刻意挑选小概率事实建构“民国”,或因于渴望在历史观上突破传统,或是出于对被革命毁坏了的“富裕的有地位的”生活及相应体制的深情缅怀,都可以理解,但就认识历史而言,可引以为参照,但切忌以之为真相。

那么,何以当时“低层中国”会如此之不堪呢?当然是由于传统中国人多地少这一无解的资源困境,也由于军阀、巨绅对土地的私有与控制。不过,今日不少追求独立思考的研究者认为民国并不存在普遍的阶级分化,不存在大地主阶层,但蒋廷黻的亲身观察并非如此:

我们换了一条新铁路,该路横贯黑龙江省西部。我们看到一望无垠的大地,几乎是没有人烟。到了一个地方,我仔细请教一位省府秘书:“谁保护我们?土地是谁的?”他说:“这些都是万福麟将军的。”他用手一指火车两旁的土地。过了半小时我又问他同一个问题,他的答案也是相同的。^[12](P114)

与万福麟相似,四川军阀刘文辉家族也拥地“30余万亩,遍及川西11个县”^[13](P26),而与刘文辉聚敛成就相当的四川军阀不下十余位。这样由军长、师长、省主席之类转化而来的地主家族当然数量不多,但一个县摊上一两个家族已足以让“低层中国”生态出现危机。何况非新兴权贵类型的占地百十亩的中小地主原本即普遍存在,他们还以租佃、高利贷等形式与小自耕农、佃农展开丛林式竞争。在此情

形下，“低层中国”必大概率出现当年文艺所记述的不堪生存境况。

二是“低层中国”阶层关系之发现。《白鹿原》提供了“主慈仆义”的佳话与“仁义白鹿村”的美好想象，然而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记述却多有丛林法则之气息。一是地主、农民之间存在比较激烈的生存竞争关系。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以合伙开磨坊、推荐当甲长、送青年团受训、抓铁红山当苦力等形式谋人财产，“乱捆人，要人房子，要人粮”^[14](P388)，又如《大刀记》中地主贾永贵为霸占农民梁宝成的宅基与常明义的地而巧设官司、用尽心计，“通过灵堂栽赃，逼着梁宝成杀了常明义，尔后，再把宝成当作‘杀人凶手’，绑送县衙把他除掉”^[15](P27)。二是地主之于农民的控制关系。其时文学中绝大多数农民都对地主噤若寒蝉，类似喜儿的悲惨故事屡见不鲜。那么，两者孰是孰非？史料更多支持后者。这不难想象：类似万福麟、刘文辉这样的新土豪短时间内就聚田数十万亩，其财富获得、土地兼并过程又怎能不残酷、不黑暗呢？来自太行根据地的调查还具体地呈现了今日部分学者不再相信的当年“低层中国”残酷的生存竞争：

农民普遍的借债：其具体办法，首先地主在租地对农民剥削基础上愈来愈重，使农民不得不负租而措债。特别是在不能维持正常生活条件下，因灾荒疾病或无力投机时。而不能如数交租负债者很多，地主则以本加利滚利直至下地（一般先典后死）致使农民失掉土地日益贫穷走向破产道路。农民说“一债成十害，一年借下十年的债。”其次地主又利用农民一天赶不上一天的生活，钻空子追击。^[10](P491)

地租、高利贷、官府人脉、灾荒，都可能成为地主制服农民的利器。有此种种利器，大中地主在乡村就有如“土皇帝”，十分体面、威风。20世纪30年代，淮北有的区长（多为大中地主兼任）出门“总是有十多个带盒子炮的卫兵跟随着，前呼后拥，威风凛凛”“而且擅操生杀予夺之权”^[16]。《白毛女》所叙地主之于农民妇女的性占有更是平常之事了，甚至还出现“初夜权”之类匪夷所思的悲剧。据抗战初期在山东丰县、鱼台担任妇女部长的张令仪回忆，鲁南“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书记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土地，张子敬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实行了初夜权”^[17](P80-81)。

三是“低层中国”的内在危机。《白鹿原》所叙“低层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润，和谐有序，不存在内发性危机，但20世纪50-70年代文艺呈现的则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难以生存、危机四伏的景象，“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18](P102)。考之史实，两种记述皆有情境基础：平静和谐的村庄与充满不安气息的村庄几乎一样之多。不过，平静有时只是沉默：“对沉默的另一种解释是用农村中的力量关系而非农民的价值观和信仰来解释。按照这一观点，农村的平静就可能是镇压（记忆的和/或预期的）的平静而不是同意或共谋的沉默。”^[19](P48)福柯也认为统治建立在恐惧基础之上，“统治权总是通过下层人形成，通过怀着恐惧的人的意愿形成”^[20](P70)。以此而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中那些反叛的村庄（锁井镇、杜鹃山、宁安寨、椰林寨等），既因于革命的召唤，更因于内在危机过于严重，以致压倒了民众的恐惧心理。来自东北地区的剿匪报告也显示，当地匪患之成为漫长历史问题也与此内在危机有关：

穷人当胡子怪谁？现在社会太不平等，穷的人没吃的没穿的没住的没地种。穷人饿着肚子，粮户不叫功夫，穷人拿钱买不到粮食，粮户有粮食不卖。穷人在夏天还穿着破棉袄、破棉裤，冬天冻得要死。穷人没有房子，没有地，掉一根针在地上还是人家的地方。拿土块打狗还要到人家地上去拿土块……大粮户穿的大皮袄、二狐衫、丝绸绫缎，大粮户住的大院套大烧锅。一是田连阡陌，一是地无立锥，一是朱门酒肉臭，一是野有饿死骨。俗话说狗急跳墙，人要是饿到没办法抢东西，这怪谁呢？^[21](P187)

遗憾的是,在后革命语境中,对革命不相信、不讲述、不传播或有意曲解,已成为作家适应时代的明智选择。但作为代价,今日文学也丧失了诚实记录当年“低层中国”的能力。

由以上三层看,尽管今日文学具有后发优势,却并不能真正颠覆20世纪50-70年代文艺对“低层中国”的发现。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此时代文学,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低层中国”记述方面相当欠缺。一者,典雅、优美的唐诗宋词极少提供“低层中国”的信息,《水浒传》《聊斋志异》等虽涉及江湖、荒村、古墓等乡村景观,但仍无多大兴趣去关注一个负债农民的生存境况,或孙少安、孙少平式的农夫曾经有过的少年情怀、青春爱恋。古典士大夫文学即便述及“低层中国”,往往寄寓的也是文人自身或逍遥或虚空的诗性想象。二者,五四以后废名、沈从文等“抒情派”乡土写作延续了士大夫文学的这一局限。沈从文小说大量为“低层中国”之事,但从中无从觅寻的恰是“低层中国”的生存样态及其内在结构。其情形,略近于雷蒙·威廉斯对所谓“田园诗”的批评,认为其中“没有农业劳作和劳工的田园风光:树林和湖泊构成的风景”恰好将“生产的事实被从中驱除了”“不协调的谷仓和磨坊被清出了视野”“林荫路一直通向远处的群山,在那里没有任何细节来破坏整体的风景”^[22](P173)。这是典型中产阶级视野下的“田园”景观,可以说“分明是中产阶级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认同和向往”^[23]。这当然不是否定杰出如沈从文者在生命观照层面的温暖与宽广,而是说就“低层”发现而言,他的确有意识地遗忘、删除了乡村生存竞争与社会控制。三者,鲁迅以及“乡土文学”诸作者也有在“乡”而不言“土”(土地)的缺陷,“只看到了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农民思想的落后性,却并不去关心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以及他们对于‘土地’生死相随的深厚感情”“热衷于避‘土’谈‘乡’”“很大程度上使‘乡土文学’的文化批判,变成了一种脱离‘乡土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空谈”^[24]。可以说,这些文学都不同程度地短于或匮乏于“低层中国”的发现。以此而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有关“低层中国”诸多近于实录的叙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发现。尽管它在后世与中产阶级文化格格不入进而遭遇信任危机,但置之它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仍是“短二十世纪”中国深具“诗性正义”的写作。与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按照社会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来行动并知足”、将“秩序和安全”当作“唯一的兴趣”^[25](P119)的中产者文学不同,此时代文艺提供的“另类版本”,为下层民众争取基本生存权利、部分获取“人”的尊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低层”阐释中的竞争

不过,此时代文艺在发现“低层中国”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它不完全是对社会实相的忠实记录,而是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视角展开的观察与叙述。这直接因于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摸索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乃改变下层人民命运、实现国家富强的唯一选择。因此,过去被绅士文化否定并抑制的阶级概念就被凸显出来,成为文学区分“可以叙述之事”与“不可叙述之事”的主导概念,故全面理解此时代文艺还须对其中“为了以某种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不得已放弃了什么东西”^[26](P51)的问题予以剖析。这就需要从话语竞争入手。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低层中国”已按自我逻辑长期运行。这意味着,此时代文艺呈现必然是阶级话语与诸种本土逻辑竞争、冲突和妥协的结果。

在“低层中国”中,宗族乃最强势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话语,也因此,宗族在此时代文艺中成为被警惕、排斥的对象。究其因由,则在两层。一是中国革命与宗族的现实关系比较复杂,“以乡村宗族体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结构造成乡村社会的相对封闭和稳定,成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以及对乡村进行改造的极大障碍”,尤其国民政府还有意识利用乡村保甲制度“作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试图切断乡村社会资源向中国共产党方面流动的途径和渠道,企图以此来限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27]。在此情形下,尽管有形式多样的合作(利用、反利用、合作双赢等),但由于革命深度介入“低层中国”的基本诉求,两者关系仍以冲突为主:“以前,整个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就已经起到了防止像农会这种组织建立的作用,家族……宗庙都混淆了阶级界限,并且大多数雇佣劳动者没能认识到将他们自己团结起来的必要性,真正意识到了此必要性的那些极少数人,在过去又被保甲制集团内部告密

所钳制。”^[28](P64)与此相应,宗族往往也是农民争取自身阶层利益的障碍。《新儿女英雄传》女主人公杨小梅原型张惠忠的父亲,即因“成立了农会、妇救会、青联会等农民基层组织”并“有组织地同地主恶霸展开了斗争”,结果在“‘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前一天晚上”被“秘密杀害”^[29]。其中存在蹊跷:在宗族中“雇佣劳动者”、贫苦农民人数居于优势,何以有利于农民的农会等组织反而被钳制呢?这与宗族组织实为乡绅阶层控制有关。河北十里店的资料显示,无论家族委员会还是宗庙委员会,其“成员必须具有财产资格”“过去曾经规定有40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委员会成员”“对于宗庙领导而言,有一个特殊的村民名单,上面列有十个最富的人依次担任的职务”^[28](P22)。乡绅阶层既恃财力把持宗族,而贫弱农民理性的生存选择也不是与乡绅为敌,而是依附其中最强势者。于是,由宗族衍生的诸多乡村组织便自然为乡绅所用,尤其武装性质的组织(如民团、红枪会、大刀会等)就屡屡在地主、富农的操纵下“渴望保卫自己的地方利益,反对各种外来干涉”^[30](P230),其实所谓地方利益更多是乡绅阶层将自身利益叙述为所有本地人利益的结果。从淮海战役期间山东农民对解放军的强大支持来看,革命才真正符合地方利益,但在宗族组织之内,农民没有能力挑战乡绅阶层的话语权与支配权。于是,宗族为革命之敌的局面,就基本成为定局。因此,《苦菜花》中于得水团长原型于得水在领导胶东抗战时,也被迫经常处理与联庄会、大刀会等所谓自卫组织的冲突,如曾“派人利用各种关系去争取‘坏地瓜’(注:牟平大刀会首领),告诉他不要受人家的欺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联合起来共同抗战”^[31](P145),但无济于事,大刀会照样向革命抗日武装发动进攻。由此可见,此时代文艺对宗族的排斥叙述有其必然之理。二是就中国革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而言,清除宗族这一横亘于国家/民众之间的中介组织,剔除由土豪、劣绅与区乡保甲长(多由豪绅兼任)等中间获利阶层,进而由政府集中农村资源、农业剩余以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同样是势在必行之事。故在革命实力逐渐壮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宗族的政策就更见清晰:排斥而非妥协、改造而非无条件接纳,就成为最终、最优的选择。

以上两层,构成了20世纪50-70年代文艺叙述宗族问题的依据,其中包括两种办法。一乃遗忘之策。最强烈的排斥不是打击,而是遗忘。不但回避宗族与革命的合作,也回避宗族在革命中的负面作用。譬如,投机分子利用革命以遂家族之利(如《古船》之赵炳)、寻求家族与革命之双赢(如《故乡天下黄花》之孙屎根),以及红枪会、大刀会、联庄会之类宗族性组织对革命的围攻,都基本失踪。且在革命者身上也少见到宗族关系痕迹。《大刀记》中的农民英雄梁永生,虽是宁安寨“老户”,但他从未通过宗族关系去发展、凝聚年轻人。围绕着他的锁柱、黄二楞等年轻人与他皆不同姓,而长期追随他参加革命的梁志勇与他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工作关系。《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也都未从宗族资源获得支持。这其实不大符合“低层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此遗忘处理,显然是新中国在争夺、建立文化领导权之际的重拳出击。二乃碎片化方法。所谓碎片化,既指宗族只能在乡村舞台中心之外零散存在,更指它彻底丧失叙事话语组织的功能。为确保宗族的碎片化,此时代文艺采取了剥离与负面形构之法,即将宗族与正面人物剥离关系,而将之专门安置在反面人物身上。《暴风骤雨》中韩老六原型韩向阳并无宗族关系,但在小说中他与韩姓土匪成为兄弟。《苦菜花》中王柬芝原型冯柬芝,与小说中革命者原型冯德强等同姓,但作者不许冯柬芝姓冯,易“冯”为“王”。

较之宗族,宗教也是重要的本土逻辑。此处所说宗教主要指在“低层中国”影响较大的民间秘密会社以及杂糅其中的道教、佛教。宗教在现实中对革命也主要起到障碍作用,如曾经围攻于得水部的大刀会、红枪会,皆有民间宗教成分:“他们在出发时每人喝下一道符,上阵不准说话,也不能向后转,据说这样就能有老佛爷保佑,刀枪不入。”^[31](P145)而在《洪湖赤卫队》原型所在地,民间会道门组织北极会实力雄厚,仅在沔阳就会众达两万人之多,且与我苏区武装屡起战斗,甚至在一次战斗导致我赤卫队牺牲近两千人。革命对此类会道门组织,主要取反对之策。1931年9月23日《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各种宗教完全是束缚工农劳苦群众的枷锁,是压迫阶级利用他来欺骗麻醉被压迫阶级模糊阶级意志的工具。要唤起群众自动地反对宗教,不敬菩萨与毁灭神像匾额祖牌等。”^[32](P544)

不过,宗教影响力远不及宗族,故此时代文艺对之并不取遗忘之策,而直接予以负面形构:其间主掌“在家理”或北极会者,多为地主恶霸之流。不过,当年作家、编导人员肯定也意识到了一个难以绕过的尴尬:但凡宗教(尤其会道门)其90%以上成员必为下层群众,如北极会两万余会徒、围攻赤卫队的近两千名会匪,主要都是理应支持革命的贫苦农民,对此尴尬,电影《洪湖赤卫队》予以模糊处理:参与进攻赤卫队的敌人改为以保安团为主,北极会不但人数不多,且身穿八卦图案,处于镜头背景之中,不断晃动,观众不大容易看清具体面目。如此处理,有效回避了秘密宗教与人民客观实存的关系。

江湖是另一种不可忽视的本土逻辑。在此,江湖非指文人心目中“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之安顿灵魂的文化空间,而另指社会边缘人聚集之所:“游民脱离了自己的家乡和宗族,四海漂泊,‘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个家就是山长水远的江湖,前途是不确定的”“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极具危险性和不安定感”^[33](P173-174)。“低层中国”无业游民未必为多,但游民文化、江湖色彩往往渗透其中,如重义亦兼重利的行帮意识。不过,由于革命以崇高信仰为凝聚力,江湖意识的干扰较弱,所以文艺对江湖本事较少排斥,而更愿取改造、利用两策。改造如《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大刀记》等,利用则如《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等。譬如在现实中我军剿灭“座山雕”并无什么江湖色彩,不过是周密部署、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结果,但《林海雪原》对本事大加改造提升。一方面,有意设计了一批“谁也听不出”的黑话^[34],另一方面,又添置了“八大金刚”和机关遍布、暗堡重重的威虎山。这些皆为巧妙虚构,实则现实中杨子荣见到“座山雕”时“他已是穷途末路,身边只有这几个人了”^[35]。可以说,曲波是凭借他从“旧小说”悟出的故事讲法,活生生地将一个普通剿匪案例演绎成了万众嗜迷的江湖故事。

最后需要考量的是乡里逻辑。与宗族观念偏重于血缘关系不同,乡里观念偏重于地缘关系。一般而言,乡村是熟人社会,大家都“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因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在其社会关系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保持彼此往来的和谐与稳定”^[36](P141)。在此种交往模式中,同样存在阶级关系问题,不过与马克思主义强调斗争不同,儒家更重视和谐,希望在一个业已贫富分化的社会中寻求不同阶层如何有序相处。对此,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乡村时曾提出“道义经济”的概念,认为乡村社会存在某种理想的相互关系:富者被期望积善行德,能承担“乡村领袖”责任,“它有助于提高富人的日益增长的威望,在其周围集聚起一批充满感激之情的追随者,从而使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合法化”^[37](P53),贫穷追随者则应通过更多劳作、拥戴等形式来保持这种恩报关系。在1949年前,中国的地主/农民有时也存在这种关系。但“好心的地主”未必常有,兵匪旱灾却是常有,这种乡里观念对“低层中国”的润滑作用比较有限。在革命爆发后,这种兼含传统文化仁爱思想的观念本身还与革命观念存在冲突。对于此种“旧理”,此时代文艺采取了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将支持此种“旧理”的本事纳入“不可叙述之事”。譬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地主李子俊原型李忠祥在灾荒年头即热心赈灾。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宗族也往往通过设置族田而行慈善之事。但此时代文艺对这些材料基本回避,如不叙述李子俊乐善好施的过去。二是化“旧理”为“新理”,改写“道义经济”、建立同阶层(穷人)之间守望互助、“与子同袍”的新型伦理关系。《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大刀记》《金光大道》等对此皆有浓墨重彩的叙写,但无疑也是作家良善愿望投射的结果。就农民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资源能力限制,下层民众可能并无太大余力恤助他人,相反,农民可能更愿意依附、攀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更愿到精英群体中谋求人脉。在这方面,电影《Hello,树先生》所叙弱者间的同类相噬,可说是乡里关系的真相之一。当年作家对此并非没有了解,周立波蹲点土改时,亲眼见到贫病交加的农民“三天没有吃饭”“瘦得象一根麻秆儿”^[38](P24)将要饿死在窝棚而同村农民无人施以援手的悲惨景象,但后来《暴风骤雨》仍特别书写了郭全海让马等仁义之事。这类添加或虚构,明显体现了作家对于旧的乡里关系的激活与改造。

乡里、江湖、宗教、宗族四种本土逻辑,是20世纪50-70年代文艺在呈现“低层中国”时无法绕过的话语竞争对象。阶级概念与此四种逻辑之间的竞争,涉及遗忘、碎片化、嫁接、虚构等种种方法。最终,阶级不同程度地取得了这种阐释竞争的胜利。如此本事改写导致的结果是,原本驳杂、混乱、多重因果关

系重叠交织的“低层中国”被过滤、整合成一个相对单质的阶级社会。这就导致新的“不见”。当年部分作品在阶级之外别无杂物，即是趋于极端的表现。

三、新的“基层”共同体的缔结

不过，20世纪50-70年代文艺舍弃或改造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而倾全力凸显阶级的叙事处理，并非不可理解。其实，较之坚决“舍弃”阶级事实的古典文学及废名、沈从文等“抒情派”小说，其存在堪称弥足珍贵，因为就“低层”人物而言，与阶级有关的生存境况及其社会关系，无疑是比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更纠缠灵魂的事实。写下层民众而排斥、拒绝呈现其真实的经济政治境况，究其根本是要把民众处理为可以静观的审美对象，而非与自己一样的渴求改变命运的人。亚当·斯密说：“大人物从来不把地位比他低下的人看作同胞”^[39](P67)，中国的士大夫文化及现代“抒情派”多少有此弊病，但中国革命领导者及其写作者群体却一反常例。后者讲述下层民众生存的痛苦，实乃有关民众的现实的“生存的策略”，因为“文化实践是第三世界与少数者民众经济与政治斗争中最本质的一个因素”“少数者集团只有得到文化认可才能取得物质的生存”^[40](P360)。即是说，《创业史》《山乡巨变》诸文本，并不止于反映现实，而是寄望通过文学实践来寻求正义，创造新的可致幸福的总体性现实。

如此创造，集中表现在将“低层”翻转为基层，并以新的基层共同体意识的缔结来为可能的正义社会提供根基。这是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化基础及旧的社会分裂。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同感”“以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群众现在认同于它，以前可能认同于体制的精英人物现在则被它拒之于门外。”^[41](P255)而且，亨廷顿还触及问题的核心：新的文化认同属于谁？他的答案是：群众。鉴于群众与精英的认同的天然差异，这种新的认同感的创造必然是对古典文化甚至五四新文化的逆转，也可能包含珍贵的事物。那么，当年作家是怎样创造了新的基层共同体意识的呢？

首先，表现于共同富裕想象。就“低层中国”而言，其共同体意识主要以血缘为基础，“宗族思想，牢不可破；国家观念，甚形薄弱”“换言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42](P294)。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基层政权的普遍建立，政治认同压倒血缘、地缘成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与此相应，文艺亦成为新的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孕育载体。其间最突出的是共同富裕想象。《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小说，都有力建构了共同富裕的社会想象。当然，此种建构是高度选择性的结果。其实，尽管农业合作化事关国家工业化之大局，事关中华民族逆天改命之根本大计，但在农民看来，别人富裕与否、国家工业化计划云云，与自己毫无关系。富人如此，穷人亦然：“那些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是没有闲心去关切什么社会变革的宏图大计的。他们是观潮派和渐进主义者，仅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绝对有关的小修小补。”^[43](P41)但新中国没有办法完全顺应农民的狭隘目光与自我考虑，在此情形下，当时基层干部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完成合作化工作。一是干部自上而下的工作压力。柳青本人即常以县委常委身份采取多种方法促使农民入社，如对《创业史》中冯有万原型董炳汉是反复开会、连劝带批，“把董炳汉批得痛哭流涕地认识了错误”^[7](P235)，对完全不听劝的梁大老汉原型、区委书记董廷芝的父亲是逼，“把他父亲分开，全家其他人入社”“全家人监视他”“逼老汉入社”“后来老汉总算入了社”^[7](P234)，对劝、逼皆不管用的白占魁原型肖德新则是让“县司法部门把他拘留一段”^[43](P151)。二是合作社无形的压力，如多数农户入社后，单干户可能面临用水、用路、用工等难以解决的困难。对这两层压力，《山乡巨变》有所实录，《创业史》《金光大道》等则基本舍弃不述。

然而，这种本事删减并不宜视为虚假，实则它牵涉到中国革命最令人可敬的共同富裕的设计。中国革命以及柳青这样的写作者面对的，是如此现实：

卢明昌(按：《创业史》中乡支书)的原型也有冯继贤一部分，继贤在民国十八年跟他爸出

去讨饭,三个小妹妹在家里等候,到天黑,父子俩空着手回到了家,全家大哭,白白饿了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在这情况下,他爸出去在冯家地主的一个桃园里上吊死了。他妈卖了大妹子,又把小妹子给了人,自己改嫁了。继贤从此给人扛长工。^[7](P283)

在人地矛盾高度紧张的私有经济下,类似悲剧必然代代复制。所以,革命必须创设新的制度,而合作化至少是可以尝试的破局之策。可以说,在其背后不仅有国家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现实需要,也存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袍泽情谊,对可能的竞争失败者和被摔出轨道者有着切实具体的关怀。

20世纪50-70年代文艺围绕共同富裕努力建构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从旧的等级地位与社会分化中解放出来的“沉默的大多数”充满强烈认同,与此相应,对已经边缘化的旧的精英势力则有所不信任与防范,具有比较明显的弱者本位特征。遗憾的是,这种新的基层共同体意识未必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这与人性中的高位模仿心理有关。正如“穿越剧”热爱者习将自己认同于王位竞争人或后宫女主、“民国迷”习将自己代入徐志摩或林徽因的位置一样。这是人性中的困境——尽管历史证明高位模仿心理从未能阻止多数农民掉入生存的泥淖,但弱者本位仍很少为大众心理所接受。中国革命之大可敬处,即在于敢于逆转大众心理并以苍生为念。所以,尽管现实中的农民执着地以强者想象去选择人生(其中小比例者会获成功),但中国革命却选择以大比例农民的最终利益作为自己政策的依据。毛泽东之谓“大仁政”,即与此有关。此时代文艺自然是以此为标准来遴选本事并进而展开有关未来的共同富裕的想象。

其次,是平等主义想象。其实,共同富裕已经涉及平等主义,只是侧重经济层面而已。革命的平等诉求是普遍性的,同时也比自由更为优先:“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41](P255)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平等指向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高与低、贵与贱、脑力与体力、城市与乡村、干部与群众、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等的对立将自然趋于缓和”的“‘等贵贱’的价值均平境界”^[44](P259)。这无疑是中国革命高尚、美好的追求,不过在现实中要实现其一二,都不能不说异常艰难,因为平等在现实中比较欠缺,在观念上更有违于多数人追求位高于人、财富优于人、名过于人的普遍梦想。因此,通俗文学非常懂得顺应大众心理。近年国内穿越剧、玄幻剧、职场剧也有这种趋从权贵的制作秘诀,如网络作家“长安野望”为新手提供的写作经验之一,即“赋予主角一个特殊的强者属性”“可以满足读者对强者人生的一种向往”^[45](P85-86)。比较起来,革命的平等主义可说是对古今中外“强者通吃”的价值秩序的不驯从与强烈挑战。客观地说,只有敢为天下先且以弱者为本位的“开朝气象”,才能拥有这么不拘一格的总体性想象力,而此时代文艺正是这一“逆向而行”的共同体想象的坚定践行者。这意味着,要从现实众多的不平等事实中建构平等想象,文学必须通过大量本事改写方可达成。

平等主义建构涉及性别、财富、权力、知识很多方面。譬如,在传统社会中知识阶层因其对知识的垄断而有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特权,但新中国力图打破此种格局,希望“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有新型的平等关系,体现在《创业史》中,即是技术员韩培生深入劳动与劳动者梁生宝的知识化。尤其后者,表现在梁生宝不仅有“君子”之德与“一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炼特征,更有着教育和启发其他农民的践履能力。其间即有儒家“士”之内圣—外王人格结构的投射。在此背后,洋溢着“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分子知识化”的平等梦想。类似虚构在财富平等、权利平等、性别平等的建构中也多有表现。然而无论哪种建构,都与传统主流价值观不尽吻合。相对于中国社会漫长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及行为逻辑,这种平等主义可谓孤独、决绝的挑战。由今观之,这些挑战有些已留下坚实果实,如以权势、财富区分为基础的等级贵贱观念被大幅荡除,有些则在当前文化/文学中有关“妇德”“义仆”“乡绅文化”的召唤中渐受侵蚀。

最后,是劳动的哲学。今天读者面对当年文学可能会有枯燥之感,如《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封面设计竟是农民牵牛耕作、秋收扬场的画面。更令读者不适的是,其处于一号位置的男女,皆是热爱劳动、长于劳动的正直憨厚之辈。客观而言,这类人物在当年也未必真的能跻身乡村政治中心。但此时代文艺执

拗地把王家斌、萧永顺这类勤劳、正直之人而非在现实中占比更大的有知识、背景和手腕的基层干部召唤为历史主体。不欣赏者当然可贬之为意识形态规训,但柳青、浩然等作家真的是希望创造一种属于劳动与劳动者的文化。对此,黄子平很不认可,认为劳动即使在当年农民中也未受到尊敬,“‘劳动’是知识分子引进的欧化词,劳动人民就叫‘受’,或者叫‘受苦’、‘受活’,都是一种无奈的生存方式”“从来没有赋予它那么崇高的价值”^[46]。这种质疑当然可以成立,不过,努力将劳动融入新的认同,并不等于这种认同及相关尊严政治已经成为现实。实则此时代文艺基于弱者利益(不是意愿)所欲建构的价值,往往逆金钱、权力、颜值而动。而这也正是其挑战性、创造性之所在,其作者可谓“能为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提供崭新计划的人”^[47](P46)。于今观之,这种劳动哲学的建构,在当年确实发生一定作用,在权势文化、“颜值经济学”席卷大众精神空间的当下也兼具现实资源的价值。

以上劳动哲学、平等主义、共同富裕,共同构成了20世纪50-70年代文艺在缔结新的基层共同体方面的主要努力。此外,将传统乡里关系发展成一种“真诚互助、温暖和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被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所取代”^[48]的利他主义新文化,也是其用力之处。这些认同建构皆为中国革命翻转“中国的低层机构”时的积极创造。不过,无论是新的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还是对“低层中国”真相前所未有的呈现,都在当下学界聚讼纷纭。这不仅因为此时代文艺对“低层中国”的发现与重构是通过本事删减、虚构而来,更因为它用以组织叙事的话语与今日中产阶级文化扞格不入。可以预测,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另类的弱者本位的文艺都将面临失语状态。由今观之,它有关劳动、平等、共同富裕等价值的恋恋难舍,它对宗族、宗教、江湖、乡里等本土逻辑的舍弃与改造,都可为我们提供反叙述的契机,它有关“低层中国”生存境况、阶层分化、内在危机的如实呈现,则可检测写作者的良心与历史判断力。

参考文献

- [1] 赵牧.“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东岳论丛,2017,(4).
- [2]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3] 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4] 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5] 陶东风.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当代文坛,2008,(1).
- [6]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 [7] 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等.柳青传略.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 [8] 刘秉荣.《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原型是谁?炎黄春秋,1996,(2).
- [9] 李锐.旧址.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 [10]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档案馆.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3.
- [11] 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12] 蒋廷黻.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 [13] 王治安,王飞,王晓.庄园秘闻.成都:巴蜀书社,2004.
- [14]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
- [15] 郭澄清.大刀记(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 [16] 宋之英.寿县一瞥(续).自觉,1933,(8).
- [17] 李延国,李庆华.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济南:泰山出版社,2015.
-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 [20]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1] 黑龙江省档案馆.剿匪斗争(内部资料).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 [22]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3] 陈佑松.中产影像:新世纪中国影视中的中产阶层形象.当代电影,2016,(12).
- [24] 宋剑华.无“土”之“乡”与鲁迅的彷徨.鲁迅研究月刊,2022,(6).

- [25] 费孝通. 中国绅士.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26] 埃娃·多曼斯卡. 邂逅: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27] 吴晓荣. 从血缘到阶级: 中央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宗族组织的瓦解及改造. 苏区研究, 2021, (6).
- [28] 伊莎白·柯鲁克, 大卫·柯鲁克. 十里店(一): 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 龚厚军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9] 李红怡. “杨小梅”的昨天与今天——记《新儿女英雄传》女主人公原型张惠忠. 中州统战, 1999, (2).
- [30] 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1845-1945. 池子华、刘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31] 许建中. 昆崙英雄于得水.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2.
- [32] 江西省档案馆.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33] 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34] 姚丹. 重回林海雪原——曲波访谈录. 新文学史料, 2012, (1).
- [35] 温野. 杨子荣活捉“座山雕”——“智取威虎山”的真实故事. 党史纵横, 1996, (5).
- [36] 翟学伟. 中国人的关系原理: 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37] 詹姆斯·C.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程立显、刘建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38] 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资料), 2004.
- [39]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40] 罗钢, 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1]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42] 马寅初全集: 第6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43] 刘可风. 柳青传.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44] 萧延中. 晚年毛泽东. 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9.
- [45] 长安野望. 拆解一些故事写作.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 [46] 黄子平. 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当代文坛, 2012, (5).
- [47] 理查德·罗蒂. 后哲学文化. 黄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48] 梁波, 赵学勇. “十七年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及其当下传播的意义.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1, (2).

A Revisit of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1950s-1970s

Zhang J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arrative of the 1980s once led to the aphasia of literature in the 1950s-1970s in China. In fact, it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re not only superior to the ancient elite-centered literati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lyric literature, but also are closer to the social realities of China at grassroot level even than the new historicism narration such as *Bai Lu Yuan*. Of course, represented and not represented are always intertwined and co-existing.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is era is the result of competition and game between class discourse and local logic such as clan, religion, village and Jiang Hu. There might be many deletions, adaptations and fictions of social reality, but this may not necessarily be interpreted as false representati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common prosperity, equality and labor is a part of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fight for the right of survival of the weak.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1950s-1970s; China at grassroot level; a sense of community

■ 作者简介 张均,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 责任编辑 何坤翁